

The Research Forum of Yangzhou Culture

扬州文化研究论丛

第三辑

赵昌智 主编
广陵书社



扬州文化研究 论丛

第三辑

The Research Forum of Yangzhou Culture

赵昌智 主编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文化研究论丛. 第3辑 / 赵昌智主编. —扬州:
广陵书社, 2009.8

ISBN 978-7-80694-489-9

I. 扬… II. 赵… III. 文化史—扬州市—文集
IV. K295.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6767 号

书 名	扬州文化研究论丛. 第3辑		
主 编	赵昌智		
责任编辑	殷 伟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489-9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清代扬州学派研究

- | | | |
|-----|-------------------------|-------------|
| 1 | 清代“扬州学派”旧闻择抄 | 祁龙威 |
| 4 | 从黄侃悼念刘师培谈起 | 汤志钧 |
| 8 | 龚自珍论乾嘉学术——从《阮尚书年谱第一序》谈起 | 张寿安 |
| 32 | 论《广雅疏证》中的校勘 | 张其昀 |
| 50 | 论阮元撰二卷本《国史儒林传》 | 戚学民 |
| 61 |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考述 | 吴 凯 周星莹 钱宗武 |
| 69 | 阮元佚文两篇考辨 | 王章涛 |
| 75 | “通儒”焦循的数学研究 | 朱家生 |
| 83 | 焦循戏剧理论新议 | 明 光 |
| 95 | 读焦循《易余籀录》曲论札记 | 王伟康 |
| 104 | 书院教育与扬州学派 | 韩荣钧 |

文选学研究

- | | | |
|-----|------------------|---------|
| 113 | 陈琳新研二题——《文选论丛》补编 | 顾 农 |
| 121 | 论吴淇及其《六朝选诗定论》 | 黄进德 汪 俊 |

维扬艺文

- | | | |
|-----|-------------|-----|
| 127 | 陈含光手写所作诗文简述 | 卞孝萱 |
|-----|-------------|-----|

- | | | |
|-----|--------------------------|-----|
| 141 | 对复兴扬州评话的观察与思考 | 赵昌智 |
| 149 | 为官入藏留佳作——清代扬州人吴廷伟与《定藏纪程》 | 王自立 |
| 155 | 从盐说开去 | 黄继林 |
| 159 | 伦敦发现阮元画像 | |

书 评

- | | | |
|-----|-------------------------------------|-----|
| 161 | 扬州学派研究的重要成果
——简评薛正兴先生著《王念孙王引之评传》 | 王华宝 |
| 167 | 从文化的视角窥视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评《扬州文化与旅游研究》 | 冯春龙 |
| 171 | 书讯三则 | |

典籍选刊

- | | | |
|-----|------|----------------|
| 172 | 选巷丛谈 | 况周颐(著) 曾学文(整理) |
|-----|------|----------------|

资料辑录

- 红桥酬唱(3) / 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七卷(94) / 非知我者(120)
 大明寺僧(148) / 晏殊与王琪(160) / 扬州何园藏书(166) / 谈扬州园林(197)

清代“扬州学派”旧闻择抄

祁龙威

鲁迅有《古小说旧闻钞》。“旧闻”者，古人旧说也。窃取斯义，以为篇名。附记。

在清季和民国初年学人的笔记和书札等中，颇多清代“扬州学派”代表汪中、阮元、焦循等的遗闻轶事，兹择抄较有意义并真实可信者，聊供扬州文化研究者参考并希同志续为云尔。

一、汪中“以史治经”对日本学界的巨大影响

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的日记》第437页载：民国十一年八月廿六日，“日本学者今关寿麿来谈。他送我一部自作的《宋元明清儒学年表》。我们谈甚久。他说，二十年前，日本受崔述的影响最大；近十年来，受汪中的影响最大，崔述的影响是以经治史，汪中的影响是以史治经”。“他又说，崔述过信经。”

二、张文虎谓汪中骈文远胜龚自珍所作

上海书店刊行的《张文虎日记》第151页载：同治七年八月十六日，“阅《龚定庵集》，吴晓帆方伯新刊本……龚君文颇自命作者，其大文似学《淮南》、《鹖冠》，小品则出入沈石贤、皮、陆、罗昭谏之间，而尤近沈，似乎高古而未免如东坡之讥杨子云者。无识者以比汪容甫，则天壤矣。”按：张文虎为曾国藩幕客，时在金陵书局校书。吴煦，字晓帆，曾署江苏布政使。

三、汪中藏赵孟頫摹《急就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317页录费念慈致缪荃孙书（十六）云：“昨又在郎亭斋中假得钮匪石重校定《急就章》皇象本。据汪容甫所藏

松雪临本,参以明正统间吉水杨氏石本,于颜师古肥改之字皆为厘正。昨已录一通。”按汪鸣銮,字柳门,号郎亭,光绪间官至侍郎,因卷入帝后党争被慈禧太后罢斥,寓居苏州,好金石文字。汉史游《急就章》为草书家所宗,吴皇象、元赵孟頫等皆有临本。孟頫,字子昂,号松雪。

四、阮元祝愿“天下太平”

梁章钜《归田琐记》有“天下太平四字”一则云:“闻阮元台师在相位时,每于岁除前,用松花绢方笺,篆书‘天下太平’,字如秦、汉瓦当体,分贻知好。潘芝轩阁老以四字所出问翰林诸公,皆不能对。师曰:‘此《五经》中句耳。’阁老乃分属军机章京数人,各检一经,始知出《仲尼燕居篇》,云:‘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按四字见经仅此。其见于周、秦间书者,《邓析子·转辞篇》:‘圣人寂然无鞭扑之形,莫然无叱咤之声,而家给人足,天下太平。’《吕氏春秋·仲夏纪》:‘天下太平,万物安宁。’《韩非子·忠孝篇》:‘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赏劝也;天下太平之民,不可以刑禁也。’其见于汉人笺注者……予以壬寅春引疾解组,以海氛方恶,避居扬州,适吾师亦书此四字见赐。记予以‘心太平斋’属伊墨卿书额。翁覃溪师见而讶之,谓予曰:‘昔陆放翁以心太平自额所居,人皆谓取《黄庭经》语。然古本《黄庭经》是闲暇无事修太平,陆改修于心,盖当南渡之余,日切中原之望,吾子何取乎尔?’回忆此语已隔三十年。今云台师之书此也,年已七十有九,而予亦六十有八,若曰窃愿我师弟以余年长享太平之福而已。因装为横幅,而记其前后情事如右,俾观者有所考焉。”壬寅,1842年,阮元书此时,英军入侵方亟,所谓“海氛方恶”也。

五、刘师培评阮元学人之诗

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清晖山馆友声集》第189页载1919年刘师培与陈中凡信的附笺云:“仪征阮文达公不以诗名,其诗不主一家,不专一格,然长篇均有奇致,律诗迥绝俗氛,盖纯为学人之诗,而以性情为主者也。又五七古各篇多考证之作,与大兴翁氏略同,足审乾嘉间风气。或以文达诗出于香山,然《全集》之中,绝少摹拟之作。”翁方纲(覃溪),大兴人。

六、焦循遗稿《道听录》

北京中华书局排印吴庆坻《蕉廊脞录》第162页载“《道听录》手稿”一则云:“焦里堂《道听录》手稿凡二十巨册,中似分类,盖读书随手纪述者。老辈勤学精力过人有如此!其中所记,多国初雍乾间人文集中语。然如《全谢山集》,当里堂时人间尚无刊本,故据以为异闻,今则人人知读《鮚埼亭》矣。”按焦循此稿现藏

北京图书馆,广陵书社据以刊版印行一百部。其中杂钞原书,间附己见。如评惠氏父子说《易》有异:“半农辩驳旧说,松厓株守旧说也。”

七、“扬州二堂”的出处

北京中华书局排印陈康祺《郎潜纪闻》第781页载“谈天三友扬州二堂”一则云:“江都焦里堂循、吴县李尚之锐、歙县凌次仲廷堪,皆邃于经义,尤精天文步算之学,交相契爱,为‘谈天三友’,见阮文达《定香亭笔谈》……里堂与甘泉江郑堂藩,皆以淹博经史,为艺苑所推,世有‘扬州二堂’之目,见王柳村上舍豫《群雅集》。”

作者工作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红桥酬唱

平山堂一抔土耳,亦无片石可语,然以欧、苏词,遂令地重。因念此地,稚圭、永叔、原父、子瞻诸公,皆曾作守,令人惶汗。仆向与诸子游宴红桥,酒间小有酬唱,江南北颇流传之,过扬州每问红桥矣。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从黄侃悼念刘师培谈起

汤志钧

刘师培逝世，黄侃撰有《先师刘君小祥奠文》，录如下：

庚申年壬申朔，越六日戊寅，弟子楚人黄侃自武昌为文奠我先师刘君。呜呼！岁序一周，师恩没世，始阙奔丧，今违练祭，学丰年嗇，名高患至，夫子既亡，斯文谁系？丁未之岁，始事章君，投文请诲，日往其门。因觐之子，言笑欣欣，齿虽相若，道则既尊。我归奉亲，深山晦遁，犹蒙素书，时相存问。榆枋鸠抢，天地鹏运，小大虽殊，各安涯分。櫓枪东出，大野麟来，局侃风尘，望远兴哀。据图刎喉，智士所悝，变态百端，天谅人猜。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肺疾缠绵，知君不永，欲慰无辞，心焉耿耿。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诗表哀^①，恩德莫偁，临文徘徊。羸躯幸存，方寸已灰，虽传不习，亦负甄培。君之绝学，《春秋》、《周礼》，纂述未竟，以述顽鄙。世则方乱，师则既亡，《尧典》入棺，文献俱丧。悲哉小子，得不面墙，手翻断简，涕泣浪浪！呜呼哀哉！贤士夭年，可数而悉，颜回、韩非，贾谊、王弼，如我夫子，岂非其一，尚藉鸿名，慰斯幽室。周、孔虽圣，岂必长生？聊将此语，解我悲情。呜呼哀哉！

有人看到“丁未之岁，始事章君”，从而认为章太炎在日本东京讲学系在“丁未”，即光绪三十三年，当1907年。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也说：“丙午，余留学日本，始谒章公。丁未阳历四月二十二日，于章公座上始识刘君，缘章公与刘君彼时皆以党祸避地日本也。”^②也说“丁未”“始识刘君”。但“始事”、“始

①刘师培逝世，黄侃有《刘先生挽诗》，见《黄季刚诗文钞》，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03页。

②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

谒”、“始识”不等于就是章氏东京讲学之时。据《钱玄同日记》^①,章太炎在东京正式讲学时间为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三月(1908年4月),与《朱希祖日记》同。4月4日记:“午后,国学讲习会开会于清风亭。今日太炎所讲者为古音旁转、对转诸端。”4月8日记:“至帝国教育会,听章先生讲《说文·序》。”后因讲习会节省租金,改至神田大成中学开讲。

《钱玄同日记》4月4日至4月29日记听讲《说文》七次,与北京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基本相符。还记有5月2日至8月1日到大成中学听讲《说文》十九次。8月5日至29日,听讲《庄子》六次。8月2日至9月5日,听讲《楚辞》四次。9月9日至10月28日在大成学校听讲郝懿行《尔雅义疏》六次。10月31日,开始听讲《广雅疏证》等。但章太炎正式讲学时,听讲者八人中却没有黄侃。

黄侃没有在1908年参加章太炎东京讲学,不等于1907年和章太炎没有始识。章氏有《丁未与黄侃书》,《与刘光汉黄侃问答记》也说:“仪征刘光汉申叔,蕲黄侃季刚皆善小学,炳麟为《新方言》,光汉、侃各分疏数事。”此文,章氏自编的《太炎集》定为“丁未”文,且以刘师培、黄侃“各分疏数事”,也可说是“丁未”章、黄“始识”的佐证。

再以刘师培来说,他于1907年2月和妻何震、姻弟汪公权来到日本,加入同盟会,为《民报》撰文,署名韦裔,且与章太炎同寓。“丁未之岁,始事章君,投文请海,日往其门。因觐之子,言笑欣欣,齿虽相若,道则既尊”。清楚说明他是在章太炎寓所遇见刘师培“言笑欣欣”的。刘师培生于1884年,黄侃生于1886年,故称“齿虽相若”,“道则既尊”,从而“奠文”称之为“先师”。

这年,章太炎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申明宗旨是“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②不久,刘师培和幸德秋水等人来往,醉心无政府主义。6月10日,以他妻子何震的名义,创刊《天义报》,名为讨论“社会主义”,实际提倡无政府主义。1907年12月,刘等秘密回国,向清两江总督端方自首。到1908年2月,回到东京。4月另出《衡报》。回到日本后,“太(太炎)、少(少甫,刘师培)两公,又有齟齬之事”^③。刘师培且指使伪造“炳麟启事”。章、刘已经“齟齬”,自然不会有《先师刘君小祥奠文》所写的那些情节了。“奠文”中也明确指出:“我归奉亲,深山晦遁,犹蒙素书,时相存问。”黄侃已离开日本,当然不可能“因觐之子”。

由上可知,黄侃的“始见章君”,“因觐之子”是在1907年,治学严谨的黄侃所记是正确的。

^①稿本,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②见拙撰《关于亚洲和亲会》,《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期(1989年9月),收入《乘桴新获》,加以补记。

^③苏曼殊:《与刘三书》,《曼殊全集》,上海北新分局1928年版,第108页。

二

《先师刘君小祥奠文》是我从潘重规先生《量守遗文合钞》中看到的。

潘氏是黄侃的高弟,也是黄侃的快婿,长期在台湾各著名大学任教,他有感于黄氏“中年逝世,平生所作文章诗词甚多,但整理印行的委实是非常之少”,^①钞录所藏黄氏遗文,编订为《量守遗文合钞》,钞本用荣宝斋纸,手笔恭录,影行问世。凡《量守文钞》、《量守诗钞》、《量守词钞》共三集,《说明》写于“戊辰大雪”,“戊辰”当1988年。1989年,潘氏将此书由台湾寄赠,珍藏至今。

《量守遗文合钞》,最有价值的是有关记录章太炎、刘师培的文篇,凡《太炎先生行事记》、《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先师刘君小祥奠文》、《致教育总长汤济武论救太炎师》、《申请章太炎建议案——附太炎先生陈情书》五篇。2003年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为“章黄学派”专题索稿,曾草《读〈量守遗文合钞〉——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以应,登在该刊2003年第4期上。在这五篇中,除《太炎先生行事状》、《先师刘君小祥奠文》^②已录入湖北人民出版社根据黄侃四子黄念祥手抄本整理改订的《黄季刚诗文钞》外,其余前所未见,《梦谒母坟图题记》虽经辑载,而章太炎的跋语也未录入,乃一并刊录。考虑《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涉刘师培向清两江总督端方“自首”事,字数不多,再录如下:

丁未秋冬间,申叔师与太炎师同居日本东京小石川一椽,贫窶日甚。适其戚汪公权俭人也,为申叔投策,谓伪为自首于端方,可以给取巨资。申叔信之,先遣汪西渡,展转闻于端方。端方言非面晤申叔,钱不可得。申叔乃赴上海,与端方之用事者交谈,固未敢径赴江宁也。既而端方手书致申叔,道倾慕已久,得一握手为幸,不敢繁维,矢以天日。申叔又信之。至则遽以肩舆舁入督署,三月不见,申叔遂见幽矣。

此书盖为脱身之计,兼遂给资之谋,以迂暗之书生,值狡黠之戎虏,宁有幸乎?书稿流传,貽人笑柄,至可痛惜!然谓申叔久覆无恒,卖友卖党,又谓所言可充史料,则何不于书中辞气细玩绎之?且书中所引之人,如张继、谷斯盛、刘揆一皆存,所谓申叔所言,悉是当时实状耶?若太炎师无故受诬,至今犹在梦中,则申叔师发言不慎之咎也。要之,申叔不谙世务,好交佞人,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身后,尝尽言而不听,有失匡救之义,侃亦何能无愧乎?乙亥八月,门人黄侃记。

①潘重规:《量守堂遗文合钞》说明,台湾影印手抄本,第11页。

②《先师刘君小祥奠文》,《黄季刚诗文钞》录校有误,为“以属顽鄙”,应为“以述顽鄙”;“手翻继简”,应为“手翻断简”。

“乙亥”，当1935年，这年10月8日，黄侃在南京去世，那么这篇文章，几乎是他的“绝笔”了。

黄侃逝世，章太炎主持的《制言》第三期封里特载《黄季刚先生噩耗》。第四期载汪辟疆《悼黄季刚先生》，谓：“今年春间，为先生五十寿辰，太炎先生由苏寄联为寿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又谓：“先生平生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讥及章先生者，先生必盛气争之，犹古道也。”上引“题记”也为“太炎无故受诬”不平，并为刘师培“以迂暗之书生，值狡黠之戎虏”不安。

“题记”中所说：“适其戚汪公权俭人也”，是事实。1907年2月，刘师培在妻何震及其姻弟汪公权的怂恿下，“外恨党人，内惧艳妻，遂不得不铤而走险”^①。在汪公权出卖党人被人枪杀后，章太炎还是规劝刘师培，并以陆德明（元朗）、孔颖达（冲远）虽仕隋入唐，“何以经学名世”，以“先迷后复”相劝^②，“师培得信，竟不报”^③。这些，我在《章刘交谊及其他》^④一文中已经剖析，这里就不赘言了。

黄侃对刘师培“发言不慎之咎”深为惋惜。对刘师培“不谙世务，好交佞人，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身后”，却不失朴学家的风度。诵读“题记”，不禁有感。

①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革命逸史》第2集，第214页。

②《与刘光汉书》，见《太炎文录》卷二。

③汪东：《刘师培传》，见《吴县汪旭初先生遗集》卷三。

④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清代扬州学术》，第879~892页。

龚自珍论乾嘉学术

——从《阮尚书年谱第一序》谈起^{*}

张寿安

一、前言：中国近代知识转型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术界的新兴议题，台湾、大陆、香港、美国乃至日本、韩国的学术界都纷纷组成团队展开研究，议题亦由单一国家或地区转成区域性的内部分辨与对话。这个议题不仅将启动东西方文化重新审视各自的学术传统与知识体系，纵使在东亚儒学大传统的内部，也将令各地区重新审视各自的学术传统与知识体系。显然，分辨和重建传统知识体系是各区域文化最切身与最具使命感的方向。

中国近代的学术体制，基本上是1905年科举废除前后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仿效欧、美、日本等国家逐步建构起来的，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大学体制的建立和院系设置。这种学制变化，至今仍在进行中。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西学移植性建构之后，今天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学界严重感受到传统学术的整合意义被裂灭，传统学术的架构和体系也濒临丧失，至少错置。因此，学术界当如何钩沉出传统的学术体系并建构起传统的知识体系（极可能是多元系的），成就中国学术的整体意义，进而与西方对话，实在是时代的重大工程，尤其对从事学术史的研究者而言，更是责无旁贷。

^{*} 本文萌思于撰写硕士论文时。初稿《近代中国的学术分化与学科独立》曾报告于“儒学文化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主办，日本，京都，2007年3月22~25日），感谢铃木贞美、孙江、杨念群、黄兴涛、方维规、冯天瑜等教授所提讨论；修订稿于2008年1月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讨会报告，感谢刘述先、李纪祥、丘为君、宋家复、陈熙远等教授所提意见，本人获益良多。

要探究传统学术与近代之转折,清代乾嘉学术将是无可置疑的关键时段。乾嘉是清学的中坚,居于前近代与近代的转折期,以往学界称之为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我认为今日欲全面掌握中国近代的学术变化,必须将近四百年的学术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从晚明、清初、清中叶、晚清、民初乃至上世纪50年代,直到晚近,无论是断裂、延续、变型、刊落,都将有助于了解传统学术及其近代转折。

多年来学界对乾嘉学术的定名约有考据学、朴学、汉学、实学等数种,然多难成立。首先,实、虚相对,自宋学驳释老已然,不足为学术称名,学界辨之已明。其次,汉学乃相对宋学而言者,划地自限,实不足含摄乾嘉学术之全体。再次,朴学之名提自章太炎(实出自阮元、龚自珍),其意乃称美清儒治学以文献坚实为尚,不取丽言玄谈^①,属形容之语,非学术之名。至于考据,则是乾嘉学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绝非一种学问,就连清儒本身也反对此一称名。^②今日欲澄清学界这种误解,很有必要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新检视何谓乾嘉学术?乾嘉学术在近代学术转型进程中,它的特色为何?尤其重要的是,得从清儒自己的论述来审视乾嘉学术的特质,而非后人的评述。论者或谓综论乾嘉学术者起自二十世纪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其实不然。盖早在嘉道之际,就已有有识之士对乾嘉学术提出综论,龚自珍即其特识之代表者。

本文即以龚自珍为中心,讨论当逢其盛的嘉道学者如何反省、定位清儒自清初以来的学术工作,并从学术发展的角度阐释此一多元学术现象的意义。分四部分进行:一,龚自珍论乾嘉学术十大门类;二,阮元学圈的学术事业;三,戴震以降的“说经”传统及专门之学的分立;最后,在结论处点出晚清的另一层转折。

二、龚自珍“天下第一序”

(一)乾嘉学术是道问学?

学界普遍认为龚自珍对乾嘉学术的看法是道问学。这是因为龚自珍的

^①章太炎言:“诸学皆可以驯至躬行。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征定保,远于欺詐;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悃寡尤之士也。”《学隐》,《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章太炎全集(三)》,卷四,第481页。

^②[清]孙星衍:《答袁简斋前辈书》,《问字堂集》,香港: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丛书集成初编,卷四,第89-93页。[清]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雕菰集》,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丛书集成初编,卷十三,第212-215页。[清]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答孙符如同年书》,《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卷二十四,第214-216页。

一段话：

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祈同所归；识其初，又总其归，代不数人，或数代一人，其余则规世运为法。入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①

这是龚自珍为江藩(1761~1831)新书《国朝汉学师承记》所写的序。龚自珍的意思是遗憾多于肯定，一则遗憾江藩著书未能逃脱“世运”之外，一则遗憾江藩未能掌握有清一代学术之精华。我们可以从龚自珍分辨道问学是否优于尊德性的解答中看得出来。他说：

敢问问学优于尊德性乎？曰：否否。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训诂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②

龚自珍一再表明自己绝无独尊道问学之意。在他看来学术发展是一种循环升降，学术的先行者总是因其所据之世运而有所作为，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所作”。但这绝不表示学术可以偏守一端，所以他说“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祈同所归”。虽然面对师执辈这本独尊汉学的专著，龚自珍的批评不得不含蓄，但纵使含蓄，我们还是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对江书撰写观点的不满。他的不满不仅是对江藩固执于汉、宋学的对立立场，更是察觉到江藩的学术识见竟如此狭隘。所以最后他不得不说出若要评断有清一代之学术，江藩是没有资格的这么严重的话。且看这一段：

曰：然则胡为其特张问学，得无子之徇于运欤？曰：否否。始卒具举，圣者之事也，余则问学以为之阶。夫性道可以骤闻欤？抑可以空枵悬揣而谓之有闻欤？欲闻性道，自文章始。有后哲大人起，建万石之钟，击之以大椎，必两进之，两退之，南面而挥之，褫之予之。不以文家废质家，不用质家废文家，长悌其序，肱以听命，谓之存三统之律令，江先生布衣，非其任矣。^③

龚自珍很清楚地知道能洞视千古学术发展轨迹的睿智学者并不多见，在他

①②③〔清〕龚自珍：《江子屏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193页，第193~194页。

心目中,上下千年能具此宏视、担此重任的也只有汉代司马迁和刘向。龚自珍不仅在他的史论文章中对此二人频频赞叹,还把刘向的校讎理论视为考辨学术、论列分类的标准——“律令”。所以他自问自答地说:“古之学圣人者,著书中律令,吾子所谓代不数人,数代一人,敢问谁氏也?曰:汉司马子长氏、刘子政氏。”^①至于江藩——显然,龚自珍的评断是:“非其任矣。”不仅因为始卒具举乃圣者之事,也因为辨章学术者必须洞视道问学与尊性道不可偏执,所谓“不以文家废质家,不以质家废文家”。虽然龚自珍也承认,当其世运的学者也得长悌其序、肫以听命,认知所居世运的学术特质,但无论如何,睿智的学术史观察者必须意识到存三统之律令的重要性,不可随世运迭宕。显然,江藩在递予之间,随世运而偏绝了。当然,龚自珍也认为像江藩这种能掌握当下学术特质(端)的学者并不多见,所以他最终给江书的评断是“甄综之才”,肯定江藩综汇资料考实的贡献,也赞美他能窥见乾隆四库修书以降学术气运的大变化;^②但无论如何,江藩绝对不是能考辨千古学术源流的宏视之才。可见,龚自珍对江藩的学术识见是有所保留的,道问学一词也不是褒语。

龚自珍该《序》撰于嘉庆二十二年冬(1817)。同年,阮元(1764~1849)任两广总督。次年夏即召江藩入幕,属其校定《江苏诗征》,并议及编辑《皇清经解》、修《广东通志》、建学海堂课士诸事。江藩出示所撰书稿,阮元对其心贯群经折衷两汉之学十分推崇,遂为之刊刻并撰序于前,即《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江藩该书的编纂时间甚长,若干序跋完成于出版之前。龚自珍受江藩之请为该书作序也在之前,时年二十六。^③龚自珍这篇《序》文,写得是恍兮惚兮、惚兮恍兮,不得其象,难明其义,其中欲褒故贬、欲扬又抑的文字拉扯上下比比皆是。^④表面看来,或许是褒贬参半;但实质上,我认为龚自珍的意思是贬多于褒。尤其对于何处可褒、何处得贬,文字拿捏间十分隐涩,却又极其恰当,完全呈现龚自珍独特的文字运用与学术识见。

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与此《序》同时,龚自珍另有一封私信寄江藩,在这封信中龚自珍就非常直接地批评江书有十不妥,建议江藩弃去“汉学”一词,

①[清]龚自珍:《江子屏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194页。

②同前注,详“曰:江先生之为书,与其甄综之才如何?”一段。文长不录。

③江藩该书的编纂年代,据漆永祥考证成书当在嘉庆十六年(1811)。详漆永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249页。并参考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版,嘉庆二十三年,第644~656页。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2~113页。

④其实龚自珍许多文字都是如此。诚如他自己所言必须“径求之,纵横侧求之,又求其有所不言者”。本人研究龚自珍二十余年,仍每每被他的文字所惑,也深深被他的文字所吸引。

改书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显然,江藩并未接受。我们试将这两篇文字对看,就不难发现龚自珍与江藩在清学理念上的巨大差异。龚自珍言:

大著读竟。其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焉,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诂订,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汉与宋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裨竈、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汨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则浑浑噩噩无一切语弊矣。自珍顿首,丁丑冬至日。^①

从这段文字看来,显然,龚自珍对江藩的学术见解是不同意的。在龚自珍所举的十不安中,有三点值得留意。一,不满江藩汉、宋门户对立的学术态度(详书《序》)。二,分辨清学与汉学不同,不能用汉学来称呼清学。他解释说:某些学问在汉代只是稍开其端,并无传衍,到了清代才大盛。又说:某些学问是清人自行开发出来的,与汉学无关。最后他指出最重要的第三点:清朝自有一群超拔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所得出的独创之学。^②在龚自珍的观察中,清儒这种创发性的学问,绝非汉学一词所能涵盖。所以说,龚自珍对乾嘉学术的看法绝非道问学一端。更何况,他认为道问学与尊德性乃一组概念,进退之间,必须合论。龚自珍以道问学称江藩之书,实是指其执世运之偏,遗憾之情多于肯定,绝非的论。(虽然晚清以降的学术发展确是如此。详见下文。)

回顾清代中叶的学术界,龚自珍实在是少数有志探讨千古学术流变的学者之一,也是少数能梳理出千年经学演变之历史发展的学术史家。在这一

^①此篇原附《江子屏所著书叙》后,故冠“附”字,兹删去“附”字。见〔清〕龚自珍:《与江子屏笺》,《全集》,第346~347页。

^②〔清〕龚自珍:《〈汉学师承记〉序》,《全集》,页234。当时对“汉学”一词表示不满的还有焦循:分辨学孔子与述汉学,两相矛盾。详《述难四》,《雕菰集》,卷七,第104~105页。凌廷堪:“宋以前,学术屡变,非汉学一语可尽其源。”详《与胡敬仲书》,《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三,第203~204页。